

“双一流”建设动态



2018年第8期（总第二十五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编

2018年8月8日

目 录

【“双一流”建设】	1
“双一流”建设高校财政收入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1
“双一流”背景下构建高校评价体系的思考	3
【高教热点】	6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引思：归根结底是大学学风出了问题	6
北京高校将在 28 个学科开展“学科共建”	7
【教师与教育】	8

应对大数据教师当有“转化”思维.....	8
中国大学生“增负”增什么?	11
【国际动态】	14
美国大学是如何保障本科教育质量.....	14
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 2025 计划 创立“开环大学”.....	16
【同类高校】	19
中央财经大学成为首个被授予 CAE 认证的中国高校.....	19
上海财经大学 MPA 项目成功通过 NASPAA 权威国际认证.....	20
西南财经大学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21
【本校动态】	22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与学校签订检校合作协议.....	22
携手共赢 学校与建设银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举行	24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高校财政收入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这对被称作基础研究主力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明确的任务要求。那么，“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支持的长效机制？今后又该如何改革？弄清这些问题，对今后推进“双一流”建设至关重要。

“双一流”建设高校并非“不差钱”

充足的经费支持是高校持久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更是“双一流”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关键。但是，从现在及将来发展的态势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并非一些社会媒体所宣扬的那样“不差钱”，相反，其财政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难题。一方面是其持续上涨的办学成本，近几年，我国高校的年度支出，大都呈两位数乃至更多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投入的压力持续增大，政府对高校财政投入的增长幅度开始有所减缓。今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投入，已越来越难以维持一个办学成本和入学人数都在不断增加的庞大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高校财政来源急需多样化

我国高校存在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过于依赖政府的财政投入。目前，公立高校由政府财政拨款占比大都在40%以上，一些年份还达到近60%。这种过多地依赖政府拨款的收入结构，不仅使高校难以摆脱规模化扩张诱惑，久而久之也造成了高校自我筹资意识和能力的薄弱。要改变这种现状，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就必须克服单一向度的财政收入依赖，要走财政来源多样化的道路。

高校财政收入结构优化的三个策略

形成多样化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今后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针对当前现状，可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一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细化的捐赠配比政策，将每年政府财政投入增量资金的一部分用于配比资金，以发挥用少量政策资金撬动高校积极寻求多方资金支持的杠杆作用。建议除了将捐赠配比政策至少扩展到所有“双一流”建设高校，并将非货币捐赠也纳入配比范围。建议采用弹性配比策略，如可根据高校现有筹资能力状况，设定弱、中、强三个配比档次，分别对应 1:1、2:1、3:1 三种配比比例及上限金额。高校筹资能力越强，配比比例越低，配比金额上限越高。这样能充分考虑高校差异，促使强校不断挖掘自身的筹资潜力，同时也激励弱校抓住机会获得社会捐赠。

二是建设好校友关系，将获取更多校友捐赠作为高校实现财政来源多样化的一个突破口。在欧美一些国家，校友一直是大学最重要且最主要的募捐对象。如 2015—2016 财年，美国高校获得校友捐赠比上年增长 10.2%，达到 108.5 亿美元，占整个捐赠收入的 26.9%。为此，建议将校友工作纳入到“双一流”建设考核体系中，重视并做好校友工作。

三是建设好基金会，促使其以专业化运作累积办学资金。基金会不仅能通过筹款不断增加其资产数额，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回报等途径使自己的基金总盘子不断加大。目前，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基金会虽初具雏形，但发展较缓慢。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9 月，只有 413 家高校设有基金会（不包括研究、奖助等专项基金会），资产总规模仅 300 亿元人民币。为此，也建议将基金会工作纳入到“双一流”建设高校考核体系中，以带动高校基金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里瑟琦科教观察 2018 年 7 月 5 日）

“双一流”背景下构建高校评价体系的思考

“双一流”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对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如何识别一流和判定建设成效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对高校进行科学和全面的评价不仅关系到“双一流”的建设进程，也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处于转型中的中国高校呼唤新的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既要符合世界通用标准，又要体现中国特色。

“双一流”建设要求对高校进行全面评价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既是一个旨在提高整体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性方案，也是一个涵盖多重目标、多重任务的综合性改革方案。因此，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是评估其科研产出，而应该是一种涵盖治理结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等综合性和全方位的评价，这要求针对“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成效，建立一套全新的、综合性的评价体系。

“双一流”建设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评价体系

作为后发现代型高等教育系统，中国高校在之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道路上更多是跟随式发展，参照的是西方标准。但当中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越来越好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丢掉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在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因此，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评价体系。这种评价体系既要兼顾世界通用的标准或指标，更应该关注到高校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贡献。

高校评价体系的新理念、新框架与新呈现

“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评价体系，不应该是再给出一个新的排名，再找到一些新的指标或观测点，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该不仅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果，而且要关注建设的环境、要素和过程；不仅关注经费有多少，而且要关注建设的绩效。

决策导向、过程为主：高校评价体系的新理念

“双一流”着眼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长远目标，强调“久久为功”，更加强调评价的诊断和质量改进功能。因此，构建基于诊断和发展理念的新的评价体系符合“双一流”的根本精神。

以决策为目的的评价，其目标是为做出与决策情景相一致的判断提供理性基础。决策导向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结果要素评价，而且关注对背景、投入、过程和产出的评价。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无论是处于地方政府层面还是高校层面，都应当将这四种类型的指标嵌入在一个“投入-过程-产出-成效”模型中。

制度-知识-人：高校评价体系的新框架

新的评价框架拟从大学治理的视角来对大学制度进行评价，主要内容是设计效率实现的机制，通过大学各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目标的活动而实现大学整体的效率，以结构—行为—绩效（SCP）框架分析大学治理特征，使得现代大学的社会价值在结构中得以呈现，由此推导出大学治理的总体特征。

知识是大学系统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从输入、过程和输出三个阶段来评价高深知识，主要包括在输入阶段对高深知识发现的环境评价，高校内部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环境；从高深知识的生产过程评价，主要包括科学研究的行为评价和学科交叉以及合作研究的评价；高深

知识的输出评价主要是“研究影响力”，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价研究成果的指标，即除对学术界的贡献外，研究给经济、社会、文化、国家安全、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环境、生活质量等带来的显著贡献。

人才是大学系统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学生和教师是高校最关键的两类主体。学生发展是学生经过在高等学校的学习和校内外的活动中获得的智力、体力和精神上的提升和收获，这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最为关键的因素。教师发展是教师作为主体自觉、主动、能动、可持续的建构过程。教师发展是高校能够提供优质教育的前提，也是学生发展的外在条件，因此，教师发展也是高校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画像”显示：评价结果的多维呈现

高校是政府、教师、学生（家长）、校友和社会等多方参与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其复杂性决定了高校的评价结果需要多维度的呈现，因此可以设想采用“用户画像”的方式呈现评价的结果。

“用户画像”是伴随大数据技术发展产生的一个概念，是指根据用户的社会属性、生活习惯等信息抽象出的一个标签化的用户模型。从知识、制度和人才三个维度对一流大学进行评价，三个维度分别代表了大学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因此，可以借助用户画像理念，从三个维度对一流大学进行标签化描述，可以更全面地展示出高校的发展特征，为政府、高校、社会和学生（家长）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信息。

“双一流”建设中，一个完善的高校评价体系能够为高校制定发展战略或调整相关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提供可靠依据，为及时了解办学情况提供动态监测数据，为教育质量改进提供可靠的参照系。

（摘编自《中国高校科技》2018年第7期）

【高教热点】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引思：归根结底是大学学风出了问题

前不久，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用一句“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来形容当下中学、大学教育倒挂的怪现象，引发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快乐的大学”的确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某种弊病。大学课堂上，“翘课族”有之，“低头族”有之，“睡觉族”有之；课堂之外，沉迷游戏者、沉迷购物者、沉迷赚钱者、沉迷吃喝玩乐者比比皆是。崇高的德行、渊博的学识、奋斗的精神、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深厚的人文精神，这些原本大学中最重要的内涵，却与一些大学生渐行渐远。

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某种程度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张，迅速跨入国际标准所界定的“大众化”阶段。但客观上由于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仪器设施、课程教学方式等无法相应地进行切实提升和有效跟进，学生培养上的量大、质优难以同时保证，于是大学在人才培养上面临着“批量生产”的诸多问题，教育质量的相对下降和就业压力的陡然增加，更导致一部分大学生陷入失落和迷茫。而社会变化的日新月异，价值观的日益多元，更诱使一部分学生和教师放弃了原有的理想和操守，大学精神面临弱化的危机。

归结起来，就是学风在发生变化。对于学生而言，一心读书、钻研学习、刻苦研究的人少了；对于老师来说，把教学放第一位，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愿意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走教学相长、切磋琢磨道路的老师少了；对于学校而言，那些人性化的、服务性的、一切以学

生和教师为本的味道少了，愈发严密的各种制度如同一架机器，正在异化大学的本质。学风和校风相互激荡，使得学校和学校之间虽然千差万别，但风气变坏的危机却始终如一。

事实上，近年来教育部已经对学风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四个回归”。一是回归常识。要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二是回归本分。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三是回归初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促进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用知识体系教、价值体系育、创新体系做，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回归梦想。要推动办学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

（摘编自光明微教育 2018 年 7 月 4 日）

北京高校将在 28 个学科开展“学科共建”

12 所在京中央部属高校与 20 所北京市属高校 18 日签订《北京高校学科共建方案》，将在 28 个学科开展“学科共建”。

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与北京电影学院共建艺术学理论、与中国音乐学院共建音乐与舞蹈学、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共建外国语言文学等 6 个学科；清华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共建机械工程、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建设计学、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建筑学等 7 个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分别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共建教育学、戏剧与影视学等学科；中国农业大学分别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农学院共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等学科；北京协和医学院与首都医科大学共建临床医学学科。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也与北京市属高校的相关学科开展共建，共同推动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据了解，北京市推动央属高校和市属高校学科共建，重点突破方向有3个。一是增强学科建设实力，在科学研究上实现率先突破；二是通过加强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引进共建学校优秀博士、博士后，教师互派、互聘等方式，促进本学科学术团队的快速成长，在师资队伍上实现率先突破；三是形成资源集成的投入模式，将各种政策、经费、人才、指标等向共建学科倾斜，学校的评价、考核、激励、政策等也向共建学科倾斜，在投入机制上实现率先突破。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林克庆说，央属高校和北京市属高校签约学科共建，是进一步深化北京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北京高校内涵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北京地区高校学科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各高校要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集群效应，提高共建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2018 年 7 月 19 日）

【教师与教育】

应对大数据教师当有“转化”思维

教育信息化带来了教与学方式的深刻变革，大数据等新技术已经与教师教育产生深度融合，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助推教师教育教学全方位变革与创新过程中的巨大潜力也取得了教育界的共识。很多学校将课堂作为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主阵地，通过信息化手段对教

师进行课堂观察、数据采集和分析，得出测评结果，然后制定相应的提升措施，不断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教师要有大数据转化的主动自觉

对于教师而言，阅读一份课堂观察大数据报告的文本不难，而真正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使之进入课堂教学的操作层面，实现大数据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融通，从而将大数据变成教师反思教学行为的依据，则需要教师建立起数据“转化”的思维。

面对这一挑战，教师要在大数据转化的三个环节形成自觉：首先是大数据输入的自觉，即教师需要有一定的“数商”，即能对大数据敏感，并能进行大数据收集、分析等输入的自觉；其次是大数据加工的自觉，即在大数据输入之后，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将大数据与教学实践进行有效勾连，并将大数据转化为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等的自觉；最后是大数据输出的自觉，即在教学经验、成果等的表达、推广层面，教师需要自觉形成有数据、有依据、有证据地进行表达的习惯，使数据化表达成为教师教育教学生活的常态。

教师要有大数据转化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载体

教师需要一定的载体，才有可能将从大数据中提取到的信息转化落地。从一个教学过程的全景来看，大数据转化有三个载体：

教学设计

对大数据进行转化的一度解读在教学设计阶段。即教师在进行教学行动之前，根据从大数据中提取到的信息、自身教学风格和学情进行教学设计，通过大数据精准地定位一个教学设计的优势、短板主要困难和障碍以及和没有大数据做依据的教学设计之间的差异，从而规划好下一步行动的“蓝图”。

教学过程

对大数据进行转化的二度解读在教学过程阶段。即教师按照教学设计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一定的策略、方法将从大数据中提取到的信息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导入、讲解、提问、理答、对话等环节相互作用，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此外，教师也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课堂现场生成的大数据加以识别和提取，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用和创造，将其转化为新的大数据。

教学反思

对大数据进行转化的三度解读在教学反思阶段。即教师要对自己基于大数据的课堂教学进行反思，即通过前后数值的对比，分析自身的教学行为、课堂教学效果等通过大数据的引领所产生的变化。反思之后，教师还要能够带着这样的反思和改进措施进入下一个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形成不断依靠大数据来提升课堂教学品质的循环。

教师要有大数据转化的理性判断

使用信息化手段对课堂教学进行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是教育通过与技术的结合来推动自身改革和创新的进步表现。可以预测，这种半智能化技术手段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还会持续扩大和深入。但是，教师在拥抱这种技术手段的时候，也要对其保持理性，保持批判，尽量做到有“理”有“限”有“度”。

大数据使用的“理”

“理”就是不单就数据谈数据，而是同时注重把握大数据背后的原理或理念。教师在使用大数据的时候，要努力追求做到不但知其“术”——能读懂大数据，更知其“道”——能把握大数据背后的原理和理念，从而更加智慧和灵活地使用大数据。

大数据使用的“限”

“限”就是为大数据的使用范畴划定边界。任何一种工具的开发

都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对象，因此，每一种工具的适用性都是有限的，教师需要对测评方法与测评对象的適切性保持清醒的认知。大数据作为一种测评方法，适合何种性质的学科、何种类型的教学都需要教师进行审慎的判断。

大数据使用的“度”

“度”就是理性看待大数据手段的工具价值，不过度倚重数据。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量化测评方法只是众多教学测评手段中的一种。尽管这种方法因其精准性、直观性等优势在当前学校课堂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但因为教学过程是一个涉及教学技术、教育价值、师生心理变化等显性、隐性要素交相作用的过程，教师依然要重视传统质性测评方法的价值和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共同促进教学品质的提升。

（摘编自教育之弦 2018 年 7 月 18 日）

中国大学生“增负”增什么？

在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中国大学课程挑战度与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同时针对现存于本科教育中的“水课”现象，提出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会后，大学生“增负”的话题迅速成为媒体和社会讨论的热点，学业挑战度这一概念也由学术领域进入大众视野。从提升学业挑战度的角度出发，本科教育要增的“负”并不是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质的复合增长。

“学业挑战度”的内涵及变化

有关高等教育学业挑战度的探讨最常见于“美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SSE）的相关研究。NSSE 通过提炼大学中的有效教育实践，

在 2000 年起开展的大规模学情调查中建构了五个跨院校可比指标 (benchmark)。其中,第一个指标便是学业挑战度(Level of Academic Challenge, LAC)。彼时,这一指标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学生学习的努力程度;学生感知的课程认知目标;学生感知的院校环境。

由指标内容可见,学生的课业量和学习时间只是“学业挑战度”的一小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课程和教学过程中对高阶认知能力的强调和对学生学习投入程度的要求。2012 年,NSSE 对调查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在新的指标体系下,NSSE 拓展了学业挑战的维度和内涵,现在的“学业挑战”概念更加注重学生在认知方面的投入和课程提供的认知训练。具体而言,课程的挑战程度并不简单的体现在布置大量学习任务上,而更多的体现在科学合理的设置课程认知目标、鼓励学生在学习时对知识和经验进行反思和整合、使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学习使用数字信息等。

中美“学业挑战度”的差异

那么,与美国高校相比,中国大学的学业挑战度如何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自 2007 年起引入 NSSE 工具,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实情对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拓展成为符合中国大学生学习特点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项目,“学业挑战度”是各参与院校关注的重点。

课题组自 2009 年起的研究发现,在五大可比指标的框架下,清华本科生和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的“学业挑战度”得分都低于美国同类院校。但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学生自我报告的学习时间和学习任务量均高于美国学生,院校对于学业投入的强调与美国院校没有显著差异,“学业挑战度”指标上的差距主要在于课程认知目标不足。

随着学习挑战度的内涵不断拓展,中国高校的这一情况彰显得更突出。CCSS 课题组使用 2016 年全国调查数据,与 NSSE 同年度的

指标和相关题项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无论全国各类院校还是“985”高校,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均明显高于美国学生,但是在“高阶认知”和“学习策略”方面与美国学生相比有一定差距,写作量和课程的激发程度则远远低于美国学生得分。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高校的课程对认知目标强调的程度较低,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努力和投入,同时对写作量(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要求大大低于美国高校。

因此,中国大学生需要增的“负”在于学习策略的使用和认知能力的训练,而中国高校学业挑战度不足的关键在于改进课程教学设计,从而提升学生接受的认知训练水平,促进学生通过高阶思维深化课程学习。

“学业挑战度”的衡量与提升

那么,学校应如何使课程更具挑战性呢?在这方面,清华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2008年清华大学提出了“挑战性学习课程”(Challenge Based Learning, CBL)的课堂教学模式。

2012年,清华首次启动了挑战性学习示范课程建设,并在同年开始了第一门校级挑战性学习示范课程。2013年,校级示范课程再添三门,多个院系也开始自主探索院系级挑战性学习课程。在校院两级的挑战性课程中,涌现出形式纷呈、各有所长的多门优秀课程。这些课程紧扣全球热点问题,基于跨学科知识的支撑,具有极高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水平,这些特点都能促使学生积极克服困难、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从而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并使学生获得核心能力的收获与增值。

清华大学教务处相关团队系统梳理了清华挑战性课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同时针对如何衡量课程挑战度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评价框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部分。

- 定性部分:通过教师和学生的感受进行衡量。

● 定量部分：通过学生与教师课内外投入的时间进行衡量。

这一评价框架的设计结合了学情调查和课程实践的成果，为院校理解并提升学校课程的挑战度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只有当课程能够成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性课程；也只有当高校将“水课”变为“金课”，中国大学生方能感受到充满正能量的学业挑战，中国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方能实现内涵上的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学教育 2018 年 7 月 16 日）

【国际动态】

美国大学是如何保障本科教育质量

美国顶尖大学的教学是一个典型的哑铃型结构，高度重视两头的本科和 Ph. D.，但对处于二者之间的硕士阶段看得相对较轻。越是顶尖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这是它们的看家本钱。尽管美国顶尖大学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特别是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几乎截然不同，但在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还是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的特征：

首先，从招生阶段开始，严把入门关。几乎每一所顶尖大学都对招生极为重视。招生办公室主任地位很高，有时候就是仅次于校长和教务长的第三号人物，对是否录取每一个学生具有最终决定权。此外，大学对招生部门的人员和经费予以充分保证，投入巨大；招生过程极为复杂甚至繁琐，每一个最终获得录取的学生都会经过几轮测试和评估。除了个别看走眼的，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全部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为教育质量提供了第一层保障。

其次,从文化和经济两方面确保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生教学上。美国顶尖大学在招聘教师时非常看重其对教学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在 MIT (麻省理工学院), 重视本科生教学本身就是大学最核心的文化。教授不但必须要上课, 而且他(她)们也喜欢上课。美国顶尖大学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引导和制约着教师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教授的工资通常只发放 9 个月, 剩下 3 个月的收入必须要通过自己寻找研究课题和经费来解决。教授所拿到的 9 个月工资, 指的就是上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的报酬。如果教授不上课, 收入就会锐减, 甚至没有薪水; 如果课程质量不高, 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 在教学方式上, 采取小班教学模式。这是美国顶尖大学保证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手段。而且, 越是重视本科教育的大学越强调小班教学的重要性。如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核心课程中小班教学的比例甚至达到了 70%。它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教师和学生的偷懒行为。

第四, 对课程本身投入巨大。一方面, 每一所顶尖大学的本科课程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也许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中所倡导的整体知识观直接相关。表面上看, 课程是由某一位教授主持的, 但整个课程体系却是由专门的课程委员会集中力量精心设计的。特别是像芝大和哥大的核心课程, 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另一方面, 学校和院系在本科生课程投入上毫不吝啬。比如, MIT 电子工程系每年在一门课程上的投入就高达 30 万美元, 少的也有 10 多万美元。这些经费并不包含教师的工资, 是纯粹投入到课程本身, 分配给各个学生小组来使用。

最后, 强化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美国顶尖大学极为重视教学质量评估工作, 但其评估的方式不是由被评估者提交材料由评估者审读检查, 而是由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全覆盖的评价, 同行之间的评估、

高级职员对低级职员的评估、学生对老师的评估，等等，几乎无处不在，并且这种评估结果会对教师的岗位、职称和收入产生直接甚至是严重的影响。

（摘编自光明日报 2018 年 7 月 26 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 2025 计划 创立“开环大学”

《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在以设计思考理论著称的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牵头下正式启动，这次教育改革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方式，代之以师生为主导。与其说《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是一个方案，不如说它是一个对未来大学模式进行畅想的大胆的“设计”。

开环大学（Open-loop University）

开环大学是《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中最关键的计划之一。该计划创新性地解除了入学年龄的限制，此外，延长了学习时间，由以往连续的四年延长到一生中任意加起来的六年，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开环大学中的学生很有可能是处于各个年龄段以及从事不同工作的一群人，因此，开环大学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学生校园，打破了年龄结构。学生之间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强劲与持久的社会网络。同时，这种开环也意味着斯坦福大学的入学申请将更具有竞争压力。有限的名额将在背景各异、年龄不同的申请者中产生。

在开环大学的环境当中，高等教育对于每个人一生的意义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大学更注重对于职业生涯的培养。

自定节奏的教育（Paced Education）

在传统大学中，本科生按照一到四年级划分，而《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决定打破陈旧的四年级划分，代之以“CEA”——调整（Calibrate）、提升（Elevate）和启动（Activate）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调整（6~18 个月）

学生应该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学习。调整期提供短期（1~7 天）的由教员精心设计的微课程。通过微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不同领域以及教师的不同特长，了解不同的学习模型以及职业规划轨迹。

学生进而根据自身喜好、自制力以及学习习惯等来选择学习的时长（6~18 个月），从而找到学习的差距，建立有意识的学习自信。

教师起初会提供短期的课程，快速地培养学生对教学与实践的兴趣。这些课程还允许教授更广泛地接触学生，这些教授能够识别并培养出最适合在某领域成为专业人才的学生。

第二个阶段：提升（12~24 个月）

该阶段将带领学生进入一个专门领域。对待专业知识的严谨态度是此阶段的关键所在。学生开始组建个人顾问委员会，包括学术导师、个人导师以及高年级同学和信任的伙伴。预计到 2018 年，个人顾问委员将会取代其他形式的学术咨询。

提升阶段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都十分重要，斯坦福大学将取消大型的演讲教室，代之以小型的学术讨论空间，从而形成有助于教师与学生深度互动的混合环境，帮助学生获得成就。

第三个阶段：启动（12~18 个月）

在学习了如何获得深度的专业知识后，学生将知识转化到几个实际应用活动中。学生将自身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习、项目服务、高水平研究和创业中。

轴翻转（Axis Flip）

轴翻转的含义是要将“先知识后能力”反转为“先能力后知识”，能力成为斯坦福大学学生本科学习的基础。这就是说，改变传统大学中按照知识来划分不同院系归属的方法，按照学生的不同能力进行划分，重新建构院系。

《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提出，到 2024 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将推出十个建立在本科生能力之上的教学中心，并分别任命中心负责人来负责开发交叉学科的课程，每个中心负责人都将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组织结构及其架构的核心。这十个中心包括科学分析、定量推理、社会调查、道德推理、审美解读、沟通有效性等。在对学生的考察和考核方面，斯坦福大学也进行了改革。

有使命的学习 (Purpose Learning)

《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推行“带着使命感去学习”，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选择有意义的课程，并以此为基础，支撑起一段目标清晰的、纵贯毕业之后 10~15 年的职业生涯。如此，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才有能力、有意识、有担当去领导有效的实践，以抵抗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以及目前未知领域的风险。

为了使学生带有使命地学习，斯坦福大学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系列“影响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里，师生们一起通过浸润式学习和讨论，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启动“影响实验室”计划 22 年后，斯坦福大学就和麻省理工学院、印度理工学院合作，完成了一项可与登月计划相媲美的宏伟目标——为生活在南亚地区的每个人提供清洁水源。这项全球性的“影响实验室”计划实施以来，申请在实验室待一年的学生越来越多。

最后，《斯坦福大学 2025 计划》中最为核心的一条是培养具有大格局和大视野的国际领导型人才。其人才实力的国际性提升才是发展方向，应该培养具有回馈社会、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人才，即有使命感的人才。

(摘编自学术时评 2018 年 7 月 9 日)

【同类高校】

中央财经大学成为首个被授予 CAE 认证的中国高校

近日，北美精算师协会（SOA）授予中央财经大学的精算项目 CAE 认证，即“Center of Actuarial Excellence”。中央财经大学与世界上其他 30 多所高校一同跻身于获北美精算师协会 CAE 认证的名校之列。同时，也成为中国首个获此荣誉的高校。

大学的精算项目可以通过申请 SOA 的 CAE 认证来证明其在精算方面的杰出资质，但必须满足八个方面的严苛审查，包括：学位、课程、毕业人数、教员组成、毕业生质量、综合能力，与产业的关联度，以及研究的质量和数量。获得 CAE 认证的高校将在精算教育和研究方面得到 SOA 提供的特别资助。

SOA 作为全球专业的精算师机构，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当地精算行业的发展。通过 CAE 认证，SOA 期望提升精算在学术界的地位，加强对精算的研究和智力资本的开发，鼓励高校担负起提升精算学科影响力的责任，并促进精算从业者与顶级精算项目和教学团队的交流与沟通。

SOA 教育部门董事总经理 Ken Guthrie 表示，中央财经大学的精算项目为全球其他从事精算教育的院校树立了标杆，其中也体现了 SOA 致力于推动精算学科的使命。中央财经大学成为中国首个获此荣誉的高校，期望有更多的中国高校能够获取 SOA 的 CAE 认证。

（摘编自双一流高校 2018 年 7 月 21 日）

上海财经大学 MPA 项目成功通过 NASPAA 权威国际认证

2018年7月12日,全球公共政策、事务与管理院校联盟(Network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缩写为NASPAA)官方来函通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项目正式通过该组织的认证。此次,全球共有40余所大学的MPA项目申请参加本轮NASPAA国际认证,仅有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在内的6所大学获得通过,其余5所均为国外著名高校。上海财经大学成为国内通过此项认证的仅有三所院校之一。

上海财经大学MPA项目自2012年10月开始立项申请并着手推进NASPAA国际认证工作,2013年5月成为NASPAA会员院校,2015年8月提交自评报告,2016年3月、2018年3月接受现场访查,2018年7月NASPAA认证与同行评审委员会全体大会投票表决,整个认证过程历时近6年。

上海财经大学MPA国际认证列入了学校“十三五”规划,学校对MPA项目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六位教师分别负责六项学生必备能力考核,形成了以使命为主导,以学生必备能力为指标的教学质量评估和反馈体系;通过在日本、新加坡、美国举办国际工作坊及要求毕业论文加入国际经验强化了国际化的教学内涵;通过校友问卷调查和办学单位座谈会及时获取用人单位对教学内容和质量的改革方向;通过专题讲座和国内现场教学充实了学生对社会多元化的理解和领导能力,把MPA教学管理提升到了国际水平。

全球公共政策、事务与管理院校联盟(NASPAA)是国际公共管理教育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认证组织。NASPAA认证是该机构对全球公共事务、公共行政以及公共政策专业硕士学位教育达到一定培养水平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资格证明。获得NASPAA的认证通过表明了该院MPA项目在目标定位、治理结构、教师表现、学生学习、资源配置、沟通

渠道以及学生服务等方面均达到了国际标准、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摘编自上海财经大学 2018 年 7 月 13 日）

西南财经大学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7 月 20 日，西南财经大学召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推进大会。大会的主题：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

校长、党委副书记卓志强调，要科学把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的基本理念，着力聚焦“五大核心能力”提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要深刻理解“学科”的丰富内涵、科学把握学科发展基本动力、遵循学科建设基本规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能力，聚焦构建经济管理学术体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瞄准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提升成果转化应用能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思想文化引领能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党委书记赵德武就加快推进学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五点要求。

一是站位再提高。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是西财的一号工程、历史责任、共同事业、艰巨任务，要站在切实肩负“四个服务”历史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党委决策部署上来，共同投身于这项伟大事业。

二是思想再解放。要深刻认识“双一流”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自觉把解放思想和开拓创新作为建设一流学科的强大动力，用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思想再解放，

始终坚持开放胸襟、融合理念，统一思想、开拓创新，把握规律、跨越赶超，从容应对一流学科建设中的各种挑战和难题。

三是改革再出发。要拿出全部勇气和智慧，把改革精神、开放理念贯穿到“双一流”建设全过程。要正确处理建设和改革的关系，把“五大建设任务”和“五大改革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在建设中改革、在改革中建设。要激发制度活力形成整体合力，激活基层经验精准对接一流学科建设需要，激励干部教师作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四是作风再转变。要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追求卓越的优良作风，要发挥好“头雁效应”，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教师特别是党员教师要积极投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努力成为中坚力量。要大兴苦干实干之风，大力弘扬奉献精神，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五是能力再提升。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全面提高“八种本领”，努力做到“五个过硬”，着力弥补知识缺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不断增强领导和推动学校发展的本领，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建设国际知名财经特色鲜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摘编自西南财经大学 2018 年 7 月 24 日）

【本校动态】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与学校签订检校合作协议

7 月 10 日上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检校

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座谈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光骏，副检察长陈重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栾永玉，校长杨灿明，副校长姚莉出席签字仪式。

栾永玉指出，检校合作签约是双方加强合作共建的良好开端，对于促进法学教育与检察实务的良性互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助双赢，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校将以此为契机，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一道，进一步完善沟通机制，深化合作关系，创新合作模式，做到优势互补、信息共享，把检察实践和法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共建共赢。

孙光骏在致辞中表示，检校合作共商培育复合型法律教学人才和实务人才，促进检校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政法大学重要讲话的精神，是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具体实现，对于促进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实现检校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杨灿明表示，相信在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和学校的通力合作下，必将共同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提供智力支持，为法治中国建设建言献策。

姚莉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检校合作意味着检校双方将携手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共同奋斗、共同前进。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检校双方可以在智库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双千计划”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相信双方的合作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2018 年 7 月 11 日）

携手共赢 学校与建设银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举行

7月23日下午，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办学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学校首义校区图书馆举行。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党委副书记、行长王祖继，党委委员、副行长章更生、张立林，以及建行主要部门负责人、建行湖北省分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栾永玉、校长杨灿明等主要校领导、学校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建行大学华中学院首期培训班“全行普惠金融业务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出席了揭牌仪式。

栾永玉简要回顾了学校建校70年来的革命历史和教学科研及服务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谢中国建设银行对学校建设发展的大力关心、支持和帮助；此次中国建设银行与学校合作办学签约并为学院揭牌，标志着学校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进入了新的更高阶段。学校将与中国建设银行携手共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努力开创长期稳定的银校合作成功模式，构建更加紧密的产学研战略合作联盟关系，更好地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要求，共同在人才培养、人力资源开发、金融发展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田国立在致辞中说，此次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全体领导利用参加湖北省分行工作交流会的机会，来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行学院和建行大学华中学院揭牌，既是学校办学特色的鲜明体现，也为建行与高校合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他表示建行的员工们有着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但知识面往往不够，需要更多的前沿理论的指引；希望教授们从贴近现实的地方出发，与学员们共同探讨、给以启迪，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普惠金融等问题，给予一些解决方法。

田国立指出，建行大学的合作模式是试行的第一所，后续将会与

更多大学、包括国外的优秀大学合作并最终形成联盟。建行将会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给员工提供更多的受培训的机会；同时也会将这些资源向社会开放，银校强强联手，共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接班人。同时，田国立也向母校的师生们提出建议：不一定要追求名，而要追求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出中南大声音、做出中南大贡献。

（摘编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新闻网 2018 年 7 月 24 日）

主 编：高利红 雷 磊

责任编辑：黄容霞 李英楠

编 辑：彭慕媛

报 送：教育部、教育厅相关处室

交 流：兄弟高校相关部门

呈 送：校领导、全校各单位负责人

2018年8月8日

本期共印 150 份
